

# 唐宋詩學的系統樹\*

川合康三 著\*\*  
黃嘉欣 譯\*\*\*

## 摘要

系統樹便於我們觀察文學作品、作者之間的關連性，這是其優點所在。然而，本文側重於反思系統樹引發的一些問題、弊端。其一，文學本質上是複雜多樣的，系統樹的構建可能會導致文學的多樣性被忽視、某些詩人之間的繼承關係被忽略。陶淵明、杜甫就是兩個重要的例子。其二，唐宋之間當然存在連續性，但同時也有斷裂之處，系統樹難以捉住某些斷裂點。例如，我們可以從關於夜半鐘聲、桃花源的討論中，看到宋人對於事實的執著態度顯著增強，與唐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關鍵詞：唐宋詩學、系統樹、陶淵明、杜甫

---

\* 本論文為特稿，為示尊重作者，除基本排版調整，論文將不依本學報體例做出更動。

\*\* 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名譽教授。

\*\*\* 南京大學文學院博士生。

# The Phylogenetic Tree of Tang and Song Poetics

Kawai Kozo  
Emeritus Professor, Faculty of Letters,  
Graduate School of Letters, Kyoto University

Translated by Huang, Jia-Xin  
Ph.D. student,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phylogenetic tree enables us to observe the interconnections among literary works and authors, which is its primary advantage. However, this paper reflects on several problems and limitations inherent in such a system. Firstly, literature is inherently complex and divers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hylogenetic tree risks neglecting this diversity or specific lines of literary inheritance. The cases of Tao Yuan Ming and Du Fu are two important examples in this regard. Secondly, while there is continuity betwee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re are also apparent ruptures. The phylogenetic tree has difficulty capturing these points of discontinuity. For instance, in discussions of the “midnight bell” or the “peach blossom paradise,” one observes a markedly stronger attachment to factual accuracy among Song poets, which sharply contrasts with their Tang predecessors.

**Keywords:** Tang and Song Poetics, Phylogenetic Tree, Tao Yuan Ming, Du Fu

# 唐宋詩學的系統樹\*

川合康三 著  
黃嘉欣 譯

## 一、系統樹與文學史

19 世紀以來，在生物學領域，人們一直試圖通過「系統樹」(phylogenetic tree) 來圖示生物的進化歷程。這從根本上顛覆了過去的觀念——世界是全能的神創造的，包括人類和動物在內，萬物皆由神所創。系統樹將所有生物納入其中，明示相互間的關聯。其核心思想在於，生物個體並非各自獨立誕生於世，而是彼此相連。這種思維方式在生物學以外的領域同樣極具價值。例如，在文學領域，個別的作家、作品並非孤立存在的，而是在整個文學體系當中帶著某種必然性誕生，並且發揮著各自的存在意義。這與建構生物體系的系統樹觀念非常接近。文學史觀念本質上與系統樹相同，那是一種將所有作品相互關連起來的捕捉方式。將文學整體視為系統樹，決非全新的想法。

對於文學中的繼承關係的關注，很早就已經出現了。梁·鍾嶸《詩品》將歷代文學作品劃分為上、中、下三品，以「其源出於○○」的方式說明入選作者的繼承關係。譜系最上位的「源」乃是〈國風〉、〈小雅〉、《楚辭》。三者被視為詩之祖，譜系隨著時代推移而延續下去。例如，「上品」開頭所列〈古詩〉被評為「其體源出於〈國風〉」，同在「上品」之列的劉楨則是「其源出於〈古詩〉」。<sup>1</sup>僅此也就可以知道鍾嶸勾勒出了「國風→古詩→劉楨」這一連續性譜系。關於《詩品》全體的「系統

---

\* 本文據撰者於「第一屆唐宋詩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2025 年 5 月 23 日)所作專題演講講稿修訂。

<sup>1</sup> 梁·鍾嶸著，曹旭集注：《詩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頁 91、133。

樹」，興膳宏先生已經以圖表形式整理出來。<sup>2</sup>

像這樣把文學的展開與生物的系統樹相結合，並不是什麼新穎的觀點。如今拿出來談，是想指出將文學整體視為系統樹的利弊。「利」的部分，如前所述，文學作品並非孤立的存在，也不是一個一個隨意憑空產生的。作品共同構成一個龐大體系，每個作品都存在於整體的關係當中。系統樹非常便於觀察各個作品之間的關連性。

但是，今天更想關注的毋寧說是「弊」的部分，在此我想提出兩個主要問題。其一，作者、作品一旦被納入系統樹，其他的可能性很容易就會為人們所無視。文學本質上是多樣的，各種要素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系統樹的構建可能會導致文學多樣性被忽視、被單一化看待的問題，既往的系統樹忽略了某些繼承關係。下面我想舉出陶淵明、杜甫這兩個例子。

## 二、陶淵明對唐代文學的影響

陶淵明在六朝時代的接受度似乎較為有限。鍾嶸《詩品》將他置於「中品」，這在後世看來評價過低。據曹旭氏《詩品集注》，古直基於《太平御覽》卷 586 載鍾嶸《詩評》「古詩……陶潛十二人，詩皆上品」，認為陶淵明原本位列上品，然而正如錢鍾書否定這一說法，如今可以看到的《太平御覽》中，至謝靈運為止的詩人被列為上品，未見陶淵明之名。<sup>3</sup>古直似乎對《詩品》將陶淵明列在中品感到不滿。

除了被列為「中品」，《詩品》評語「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sup>4</sup>亦將陶淵明侷限在了隱逸詩人這一狹窄的框框之內。此外，前面講到「風華清靡，豈直為田家語耶」，<sup>5</sup>雖然鍾嶸自身是出於高度評價陶詩的意圖，但正如曹旭氏所指，「田家語」是相對於

<sup>2</sup> [日]興膳宏：〈『詩品』について〉，《新版 中国の文学理論》（大阪：清文堂，2008年），頁 312。

<sup>3</sup> 梁·鍾嶸著，曹旭集注：《詩品集注》，頁 336。

<sup>4</sup> 梁·鍾嶸著，曹旭集注：《詩品集注》，頁 337。

<sup>5</sup> 梁·鍾嶸著，曹旭集注：《詩品集注》，頁 337。

「貴人典雅之語」而言的，<sup>6</sup>價值判斷的基準顯然還是放在典雅一方。

除了《詩品》，了解六朝時代評價的另一條線索是《文選》。《文選》收錄了陶淵明詩七首、辭一首，合計作品八篇。這個數量究竟是多還是少，人們持有兩種看法，我認為實際上兩者都是正確的。為什麼這樣說呢？《文選》的編者昭明太子蕭統個人可以說是陶淵明的狂熱愛讀者。他不僅最早整理了陶淵明文集，留下〈陶淵明集序〉，而且還撰寫了最早的陶淵明傳記〈陶淵明傳〉。這成為了後來《晉書·隱逸傳·陶潛傳》、《宋書·隱逸傳·陶潛傳》的藍本。因此，蕭統個人當然希望採入大量的陶淵明作品。但是，《文選》應該收錄適合展示各類體裁規範之作，這是它的基本性格，而陶淵明之作並不符合當時的文學規範。換言之，就蕭統個人而言，固然希望多多收錄，但作為《文選》這部詩文集的編者，他顯然無法這樣做。大概就是這種矛盾，使得陶淵明的入選作品定格在八篇這個數字吧。可以說，這已經是在編選原則的制約下，盡可能多收錄的作品數量了。

前面提到陶淵明文學偏離當時的規範，在六朝文學整體當中，他的作品確實是特異的存在。首先，當時的文學活動幾乎全在都城建康開展，從事文學創作的大多是朝廷官僚。而且，他們多是身居高位的官員、當時的貴族階層。相比之下，陶淵明一生絕大部分時間都在遠離都城的潯陽度過，雖然曾經數次擔任地方官職，但任期都不長，甚至可能未曾踏足建康。這樣的社會地位與生活和其他六朝文學者迥然不同，他異質的文學與此無疑大有關係。正因為遠離當時一般的文學環境，未受其束縛，才能建立自我獨特的文學。

儘管陶淵明特異的文學脫離了主流的文學環境，但我認為他的作品在六朝時代已經相當廣泛地流傳開來了。

契機之一是同時代的顏延之。眾所周知，顏延之與陶淵明有著個人的接觸與交流，在其去世後撰寫了〈陶徵士誄〉。顏延之是身處政界、文化界中心位置的人物，或許正因為他的推舉，陶淵明這位偏遠地區的詩人得以為世人所知。百年後昭明太子蕭統對陶淵明的熱愛，恐怕也是以顏延之為媒介。

---

<sup>6</sup> 梁·鍾嶸著，曹旭集注：《詩品集注》，頁 346。

同時代的顏延之、梁朝的昭明太子，兩人均是南朝文學中心位置上的大人物，他們對陶淵明的喜愛，無疑促成了更大範圍的接受與喜愛。下面舉出一例。王績生活於隋末唐初，是私淑陶淵明的一人。他模仿〈五柳先生傳〉作〈五斗先生傳〉，模仿〈自祭文〉作〈自作墓誌文〉。這明示了王績對陶淵明的景仰與追隨。此外，從王績作品可以看出，他周圍還有多位無名人士同樣思慕陶淵明。雖然這些人的名字與作品如今都已湮滅，但他們曾經的存在讓人不禁推測，陶淵明於六朝已經在相當廣泛的階層中為人們所接受與傳播。

陶淵明文學的接受在唐代以降也一直持續，其中頗為明顯的表現之一就是「和陶詩」。最初創作此類詩歌的是韋應物，他有仿效陶詩之作〈效陶彭澤〉、〈與友生野飲效陶體〉等。

霜露悴百草，時菊獨妍華。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

掇英泛濁醪，日入會田家。盡醉茅簷下，一生豈在多。（〈效陶彭澤〉）<sup>7</sup>

這裡出現了陶詩常見的菊花、濁醪、埋頭飲酒，確實有著強烈的陶淵明風格。也可以說，這首詩聚集了陶詩的要素，形成了複製品似的詩作。

另一首〈與友生野飲效陶體〉寫道：

攜酒花林下，前有千載墳。於時不共酌，奈此泉下人。

始自翫芳物，行當念徂春。聊舒遠世蹤，坐望還山雲。

且遂一歡笑，焉知賤與貧。<sup>8</sup>

這首詩也涉及陶詩的重要主題之一——生死問題，從中能讀出在煩悶裡品味生之喜悅，試圖忘卻其餘人事的態度，讓人感覺有著陶詩的影子。韋應物提取出了陶淵明的本質要素去創作模擬詩。另外，〈東郊〉詩雖未標明是擬作，但也明言對陶淵明的思慕：「終罷斯結廬，慕陶真可庶。」<sup>9</sup>

韋應物之後，白居易創作了更為系統化的和詩〈效陶潛體詩十六首〉。模擬陶淵

<sup>7</sup> 唐·韋應物著，孫望編著：《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卷4，頁189-190。

<sup>8</sup> 唐·韋應物著，孫望編著：《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卷4，頁192。

<sup>9</sup> 唐·韋應物著，孫望編著：《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卷3，頁170。

明的連作詩大概自白居易開始，眾所周知，蘇軾次韻所有陶詩，乃和陶詩之極。

韋應物使用陶淵明詩的素材，創作出頗具陶淵明風格的詩作，白居易的模擬詩則與此不同，他追隨陶詩的境界、陶淵明追求的人生方式。換言之，白居易與其說是模擬陶詩，毋寧說是表達他對陶淵明詩歌世界的共鳴。詩題「效陶潛體」看似模擬詩，但實際上並非單純的仿作，而是白居易自身的創作，與模擬詩性格相異。

同樣是模擬陶淵明，但我們可以看到韋應物、白居易的區別。不過歸根究底，他們都延續了鍾嶸《詩品》所言「古今隱逸詩人之宗」的一面，也就是否定世俗，在隱逸生活中追求精神品位與自由。此處聚焦於和陶詩的創作，舉出了唐代的韋應物、白居易二人，實際上除他們之外，其他詩人往往也繼承了陶淵明此種面向。這是系統樹上的一大枝幹。

但是，在這裡我想討論的不是陶淵明的隱逸，而是有別於隱逸譜系的方面，探討系統樹確立之後往往難以察覺的另一繼承脈絡。

其中一大重要人物就是杜甫。杜甫繼承了陶淵明將私生活的具體細節導入詩中的寫法。例如將自己的孩子寫入詩中，除了西晉左思〈嬌女詩〉這一例外，有意識地以此為詩歌題材的就是陶淵明。他有〈命子〉、〈責子〉、〈與子儼等疏〉等等直接以自己的孩子為對象的作品。此後三百年，這樣的詩歌幾乎沒再出現。直到杜甫筆下，他比陶淵明更為頻繁地寫到自己的孩子。逮至中唐，這已成為極為普遍的現象。

不僅是孩子，陶淵明還將日常生活各種具體場景導入詩歌，杜甫也繼承了這一點。相較於西歐，中國詩歌確實更傾向於取材現實，但並非所有現實事物都能成為詩的內容，題材的選擇是詩之規範在無言中決定的。陶淵明突破了這種定式化，將過去未曾納入詩歌的生活場景寫入作品，杜甫進一步繼承。由此，詩歌內容得以大幅擴展。

杜甫還繼承了陶淵明文學中的自我描寫方式。〈歸去來兮辭〉是陶淵明描寫辭官歸隱的契機及其生活的重要作品，〈序〉文過去鮮少受到關注。〈序〉中描繪的陶淵明無法自主判斷和果斷行動，容易受他人意見左右，缺乏主體性。他既沒有生活能力，也沒有規劃，只能隨遇而安，過著漫無目的的生活，是難以依靠的男子。換言

之，陶淵明所描繪的自己，可以說與厭惡世間污濁、果斷走向隱逸的高潔之士的形象完全相反。這樣的自我戲畫化、自嘲，是陶淵明自我認識的一大特點。他的〈自祭文〉、〈擬挽歌辭〉，亦即想像自我死亡的作品，我們也應該理解為自我戲畫化的幽默表現。這種捕捉自我的方式，在中國文學裡是極為特異的。

繼承了這種自我認識方式的，是杜甫。以〈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為代表，杜甫在作品中亦屢屢自嘲，進行戲畫化描寫。

細緻描寫自己的日常生活、將自身塑造成悲慘而滑稽的人物，這兩點正是把陶淵明與杜甫連結起來的紐帶。在將陶淵明視為隱逸詩人的系統樹當中，並未納入這一繼承譜系，但這無疑是中國古典文學不可或缺的特質。

### 三、從杜甫到中唐

杜甫在世時名聲不顯，這一點眾所周知。但是，在他去世後，對他的評價卻意外地迅速展開。元稹、白居易、韓愈等中唐代表性詩人很早便讚揚杜甫文學。元稹將杜甫奉為《詩經》以後最偉大的詩人，肯定杜詩涵蓋了《詩經》以來所有的詩歌，有容乃大。白居易則重視杜詩對政治、社會的批判。韓愈讚賞杜甫突破既有模式，具有自由奔放的表現。三人各自從不同角度讚揚杜甫，這表明了杜詩的多樣性與豐富性，可從不同的視角不斷挖掘。此外，三人都在杜詩當中看到了各自的文學追求：元稹在讚揚白居易時，同樣強調他的文學的廣大規模；白居易的杜甫評價與他自身的諷諭詩創作密切相關；韓愈則是探求像杜甫那樣打破定型的文學表現。

#### （一）韓愈的奔放表現

在三人之中，接下來我想重點看看韓愈關注的杜甫的表現，及其在孟郊、賈島、李賀等中唐詩人筆下如何流動，這尚未被納入既往的系統樹。這是因為過去對杜甫的理解、評價主要集中在他的苦難人生與誠實人格。「詩聖」的稱號不僅意味著杜甫

作為詩人擁有最高成就，也意味著他是具備儒家道德修養的完美典範。然而，這種評價方式的問題在於，它將作品視為認識作者人生的工具，而忽略了文學的對象應該是作品本身，而非詩人的個人經歷。

韓愈著眼於杜甫作品，而非其人格。他注意的是作品的表現，而非內容；是杜詩衝破規範的奔放表現，而非其內容合乎儒家理念的一面。這不同於過去對杜甫的正統性定位，但正因如此，他揭示了另一條過去未受重視，但對文學來說至關重要的發展脈絡。

我們先來看看韓愈關於杜甫的言說。〈薦士〉詩有如下詩句：「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興得李杜，萬類困陵暴。後來相繼生，亦各臻閭奧。」<sup>10</sup>韓愈寫到李杜詩歌使得萬物遭受暴力的壓迫。儒家的文學觀認為，文學應當服務於禮教，對儒家式教訓有用的文學才有意義可言。韓愈捕捉文學的方式與此全然不同。

「詩歌使萬物受苦」的說法聽起來頗為奇異，這在韓愈的〈雙鳥詩〉中有更為詳細的展開。〈雙鳥詩〉描述了兩隻從遠方飛來的鳥，它們不停地鳴叫，導致其他生物都陷入沉默，世界也停止了運作。最終，天帝決定將這兩隻鳥分別幽閉，使其沉默。

雙鳥海外來，飛飛到中州。一鳥落城市，一鳥集巖幽。不得相伴鳴，爾來三千秋。兩鳥各閉口，萬象銜口頭。春風卷地起，百鳥皆飄浮。兩鳥忽相逢，百日鳴不休。有耳聒皆聾，有舌反自羞。百舌舊饒聲，從此恒低頭。得病不呻喚，泯默至死休。雷公告天公，百物須膏油。自從兩鳥鳴，聒亂雷聲收。鬼神怕嘲詠，造化皆停留。草木有微情，挑抉示九州。蟲鼠誠微物，不堪苦誅求。不停兩鳥鳴，百物皆生愁；不停兩鳥鳴，自此無春秋；不停兩鳥鳴，日月難旋轉；不停兩鳥鳴，大法失九疇。周公不為公，孔丘不為丘。天公怪兩鳥，各捉一處囚。百蟲與百鳥，然後鳴啾啾。兩鳥既別處，閉聲省愆尤。朝食千頭龍，暮食千頭牛；朝飲河生塵，暮飲海絕流。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sup>11</sup>

<sup>10</sup> 唐·韓愈著，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卷5，頁528。

<sup>11</sup> 唐·韓愈著，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卷7，頁836。

這首詩顯然是在寓示傑出表現者的宿命。二鳥之「鳴」，與詩人通過「詩」的方式進行表現是相通的。詩人的文學表現在折騰這個世界——這樣的看法，和韓愈〈薦士〉詩談論李杜時所言「萬類困陵暴」緊密相關。

此外，杜甫也有詩句提及表現這種行為困擾天帝。例如，他在褒揚劉少府畫作的詩中寫道：

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元氣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sup>12</sup>

詩中蘊含一種理念：世界原本由天帝掌管，如今竟被人類通過畫創造出來，這種行為是對天的冒瀆。創造世界的天帝與通過繪畫創造世界的人類，形成了對立關係。韓愈詩中的「雙鳥」被天帝強迫陷入沉默，這也是因為雙鳥鳴叫（即表現行為）與天帝創造和支配世界的行為對立。這種看法與杜詩對繪畫的描述相通。

韓愈與孟郊的〈城南聯句〉也講到李杜詩歌具有與造化相同的作用力量：

蜀雄李杜拔（愈），嶽力雷車轟。大句幹玄造（郊），高言軋霄崢。芒端轉寒燠（愈），神助溢盃觥（郊）。<sup>13</sup>

詩中寫到李杜是突出的蜀地詩豪，猶如五岳般力量強大，雷鳴般震撼世人。非凡的詩句影響到玄妙的天地造化，無與倫比的語言摩擦高聳雲霄的山岳，筆端寒暑交替，連神明助力亦溢滿手中酒杯。

關於杜甫，韓愈還談到：

近憐李杜無檢束，爛漫長醉多文辭。（〈感春四首〉其二）<sup>14</sup>

「無檢束」可解釋為李杜的性格與生活方式，但也能理解為詩與人是一體的——作者的為人、詩歌皆不受拘束，奔放自由。

<sup>12</sup>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卷4，頁276-277。

<sup>13</sup> 唐·韓愈著，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卷5，頁482。

<sup>14</sup> 唐·韓愈著，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卷4，頁369。

## （二）「冥搜」與「冥觀」

杜甫一般被目為「現實詩人」，但另一方面也有試圖描繪超越現實的世界的詩句。他想要探索可視之物背後的世界。例如，〈同諸公登慈恩寺塔〉詩云：「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sup>15</sup>這兩句描繪大雁塔之高，甚至摩天而立。在表現上，杜甫寫到天空的北斗七星「在」大雁塔窗中，亦即存在於同一空間。下句則說銀河因為是河流，自然就發出了水聲，詩人能聽見流水之音。對此，我認為不應該簡單地從現實角度出發，解釋為誇張手法或者比喻修辭，更要關注的是語言本身所要呈現的感受。杜甫要表現的就是實際上眼睛看見北斗七星在觸手可及之處，耳朵亦聽見了天漢流水的聲音。

〈慈恩寺塔〉一詩意在描寫這座塔是如何超越現實、多麼非日常化的空間。與此不同，杜甫還有在現實描寫當中突然插入非現實性描寫的詩作。例如〈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當中出現渡過渭水的場面，有詩句云：「群冰從西下，極目高岑兀。」<sup>16</sup>有人曾作說明，實際上渭水有時確實會有冰塊漂流。不過，與其去追究當時是否真的有流冰存在，我更願意將此解讀為幻視——詩人看見了肉眼無法目視的事物。如果這樣的讀法是成立的，那我們就可以說這是由心象產生的風景，源自詩人對不可理解之物的恐懼、對無法認知之世界的不安。恐懼不安的同時，詩人又被人類的感知與理解無法企及的世界所強烈吸引。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吟詠的大雁塔是超越現實的空間，該詩開頭部分有如下兩句：「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sup>17</sup>這裡的「冥搜」正是指探索不可視的空間。

「冥搜」一詞廣為人知的早期用例可見於晉·孫綽的〈遊天台山賦并序〉：「非夫遠寄冥搜，篤信通神者，何肯遙想而存之。」<sup>18</sup>在此說的是進入天台山這般「不列於五嶽」<sup>19</sup>的超絕地域，亦即神靈居住的神秘世界。

<sup>15</sup>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2，頁104。

<sup>16</sup>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4，頁271。

<sup>17</sup>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2，頁104。

<sup>18</sup>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卷11，頁494。

<sup>19</sup>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11，頁494。

試圖探尋和表現超越現實的世界，也就是突破常規化的捕捉現實的方式、定式化的文學表現，這正與創造嶄新的世界息息相關。通過語言來創造新世界的活動，與本來的造物者天帝的行為形成對峙。

韓愈將杜甫這位表現者視為天帝的對立者，他還曾用和「冥搜」類似的詞彙「冥觀」來討論孟郊的詩作：「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薦士〉）<sup>20</sup>「冥觀」意指觀看幽暗、不可視的事物。「洞古今」表示透視整個人類時間軸上目不可視的事物。「象外」同樣是指具象世界之外的領域，也就是追蹤一般而言不可視的、不為人知的美。這與杜甫的「冥搜」實際上是相通的。

韓愈以「冥觀」一詞讚揚孟郊，這種意欲表現不可視的世界的詩觀，顯示了「杜甫—韓愈—孟郊」的連續性。

那麼，在孟郊自身的作品裡，「冥觀」是如何被表現出來的呢？《唐才子傳》舉出了孟郊以下詩句，謂其「冥搜」：

如「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如〈謝炭〉云：「吹霞弄日光不定，暖得曲身成直身。」如「愁人獨有夜燭見，一紙鄉書泪滴穿。」如〈下第〉云「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之類，皆哀怨清切，窮入冥搜。<sup>21</sup>

《唐才子傳》所列均為孟郊吟詠貧窮之作，他還有其他搜求不可視世界的作品。尤其是在〈石淙十首〉、〈寒溪九首〉、〈峽哀十首〉等連作詩中，包含了許多可以稱為「冥搜」的詩句：

日月凍有稜，雪霜空無影。玉噴不生冰，瑤渦旋成井。（〈石淙十首〉其九）

波瀾凍為刀，剗割鳧與鷺。宿羽皆翦棄，血聲沈沙泥。（〈寒溪九首〉其三）

花木疊宿春，風颯凝古秋。幽怪窟穴語，飛聞肱蠶流。（〈峽哀十首〉其二）<sup>22</sup>

這些詩句中都是超越日常化、常識性的情景。孟郊試圖突破定型化的觀看方式，表

<sup>20</sup> 唐·韓愈著，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卷5，頁528。

<sup>21</sup> 元·辛文房著，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卷5，頁514。

<sup>22</sup> 唐·孟郊著，郝世峰箋注：《孟郊詩集箋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卷4，頁186；卷5，頁2342；卷10，頁499。

現現實中無法目視的景象。

說到超越現實的奇異世界，李賀詩尤為著名。關於韓愈與李賀的關係，流傳著許多逸聞，但兩人作品本身的關聯尚未被充分揭示。李賀的詩性世界或許也受到了韓愈的某種觸發。此外，前面提到的杜甫〈慈恩寺塔〉詩有一句「河漢聲西流」，<sup>23</sup>讓人聯想到李賀〈秦王飲酒〉那句著名的「羲和敲日玻璃聲」。<sup>24</sup>

### （三）韓愈·孟郊·賈島

關於賈島，孟郊在〈戲贈無本二首〉其一如下說道：

長安秋聲乾，木葉相號悲。瘦僧臥冰凌，嘲詠含金痍。金痍非戰痕，  
峭病方在茲。詩骨聳東野，詩濤湧退之。有時踉蹌行，人驚鶴阿師。  
可惜李杜死，不見此狂癡。<sup>25</sup>

在談論賈島的同時，孟郊也彷彿是在談論自身，那大概是因為他以自己的角度來理解賈島。冷峻、尖銳、病態、拒人於千里之外，這些正是孟郊自身的特質。不論如何，孟郊所把握的賈島，與一般認為的賈島形象有著相當大的差異。提到賈島，人們通常認為他的詩歌枯澹，帶有古風的韻味，這種印象或許來自韓愈所說的「往往造平淡」。但實際上，韓愈那首詩在說到「往往造平淡」之前，描寫的卻是一位偏離常軌、奔放的詩人：

無本於為文，身大不及膽。吾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蛟龍弄角牙，  
造次欲手攬。眾鬼囚大幽，下覩玄襲窞。天陽熙四海，注視首不鎖。  
鯨鵬相摩宰，兩舉快一噉。夫豈能必然，固已謝黯黩。狂詞肆滂葩，  
低昂見舒慘。姦窮怪變得，往往造平淡。（〈送無本師（賈島）歸范陽〉）<sup>26</sup>

全詩共四十句，前十八句談論賈島的詩作，「平淡」一詞僅出現在最後一句，在此之前描述的都是賈島的大膽、奔放與打破常規的特質。由此看來，我們可以發現這與

<sup>23</sup>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2，頁104。

<sup>24</sup> 唐·李賀著，清·王琦等評注：《三家評注李長吉歌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卷1，頁56。

<sup>25</sup> 唐·孟郊著，郝世峰箋注：《孟郊詩集箋注》，卷6，頁309。

<sup>26</sup> 唐·韓愈著，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卷7，頁820。

孟郊筆下的賈島有相通之處，也說明賈島確實具備這樣的一面。在韓愈詩中，有評價賈島為「狂詞」之言，讓人聯想到孟郊曾以「狂癡」來形容李杜。孟郊贈給賈島的〈戲贈無本〉詩中寫道：「可惜李杜死，不見此狂癡。」<sup>27</sup>「狂癡」與「狂詞」皆表示他們的詩歌逸出常軌。一般情況下，這樣的評價是負面的，但韓愈與孟郊卻轉而用於肯定。

此外，韓愈在〈酬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盧汀）望秋作〉詩中，也對盧汀脫逸於規範之外的文學表現加以讚賞：「望秋一章已驚絕，猶言低抑避謗讒。若使乘酣騁雄怪，造化何以當鑿斲？」<sup>28</sup>也就是說，以韓愈為中心的孟郊、賈島、盧汀等人，共同傾向於追求突破規範的奔放表現，而這也反映在他們對李白與杜甫的評價上。

像這樣，自杜甫而發的詩歌新動向，在既往的系統樹中並未被充分反映。這種遠離儒家規範、文學自身自由發展的動向，應被視為豐富中國古典文學的重要潮流之一，值得我們關注與重視。

## 四、唐宋的斷絕

以上是系統樹的其中一項弊端，其二則是難以捉住某些斷裂點。本次研討會的主題是「唐宋詩學」，唐宋之間當然存在連續性，但同時也呈現出斷裂的一面。其中一個顯著的斷裂點是宋人對事實的執著態度大為增強，這與唐代形成鮮明對比。下面我想舉出兩個明顯的例子。

一是唐代詩人張繼的名作〈楓橋夜泊〉引發的議論。最早提出質疑的是歐陽脩，他在《六一詩話》中寫道：

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如「袖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宮花侍宴歸」，誠為佳句矣，但進諫必以章疏，無直用稿草之理。唐人有云：「姑蘇

<sup>27</sup> 唐·孟郊著，郝世峰箋注：《孟郊詩集箋注》，卷6，頁309。

<sup>28</sup> 唐·韓愈著，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卷7，頁809-810。

臺下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說者亦云，句則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鐘時！如賈島〈哭僧〉云：「寫留行道影，焚卻坐禪身。」時謂燒殺活和尚，此尤可笑也。若「步隨青山影，坐學白塔骨」，又「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皆島詩，何精粗頓異也？<sup>29</sup>

這則詩話在後世被反覆引用，極為知名。首先可以注意到兩點。第一，這裡引用了三人的詩作，最開始的「袖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宮花侍宴歸」既未標明作者，也未注明詩題（據《能改齋漫錄》卷 11 可知此乃太宗朝王操〈投贈李昉相國詩〉）；接下來，張繼詩以「唐人」引出，並未寫出張繼之名；到了賈島的詩，不僅明確標出其名，還標明詩題。由此可見，作者的存在感漸越提升。一開始詩作的流傳並不強調作者，逐漸演變為讀詩之時留意那是誰的作品。我們可以看到詩歌接受方式的變化。

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話並非歐陽脩本人的直接言論。雖然後世普遍將這些議論視為歐陽脩的觀點，但回到《六一詩話》來看，其實是其他人的發言。當然，歐陽脩大概是同意那些話的，不過我們也應注意到他並未以強烈的語氣主張這些意見，而是作為一種談興、話題記錄下來。詩話本來就具有這種性質，並非正面嚴肅地討論詩歌。儘管如此，宋代詩話將這些內容視為歐陽脩的正式主張，並加以反駁。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 23、《詩林廣記》卷 10 等書中都有相關討論，大概可以總結為兩個方向的反駁：一是像《石林詩話》那樣談到自己實際上曾到吳中，確實在夜半聽到鐘聲，證明那是真實存在的；二是像《王直方詩話》、《潛溪詩眼》、《復齋漫錄》等，舉出唐代其他詩人作品或《南史》等文獻中也出現了夜半鐘聲的記載，以證其為事實。<sup>30</sup>宋人這一系列議論的共通點在於，他們關注夜半鐘聲是否真實存在，並認為如果不是事實，就不應寫入詩中。

到了明代，這種偏重事實的詩觀受到了否定。在《詩藪》當中，胡應麟論及韋應物詩句是否事實的爭議，他認為詩歌合乎事實與否並非問題：

<sup>29</sup> 宋·歐陽脩：《六一詩話》，收入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 269。

<sup>30</sup> 《苕溪漁隱叢話》和《詩林廣記》當中引述了《王直方詩話》、《石林詩話》、《潛溪詩眼》、《復齋漫錄》等多種詩話對於「半夜鐘」展開的討論。詳參宋·胡仔著，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前集卷 23「半夜鐘」條，頁 155-156。宋·蔡正孫著，常振國、降雲點校：《詩林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前集卷 10「楓橋夜泊」條，頁 181-182。

韋蘇州：「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宋人謂滁州西澗，春潮絕不能至，不知詩人遇興遣詞，大則須彌，小則芥子，寧此拘拘？癡人前政自難說夢也。<sup>31</sup>

清代袁枚的詩觀雖說與胡應麟不相容，但他同樣指出了拘泥於事實之弊病：

唐人：「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詩佳矣。歐公譏其夜半無鐘聲。作詩話者，又歷舉其夜半之鐘，以證實之。如此論詩，使人天闕性靈，塞斷機括，豈非「詩話作而詩亡」哉？<sup>32</sup>

換言之，時至明清，論者重視的是詩歌內部的趣味，然而此前宋代一貫認為詩必須忠於事實。

我們再看看宋代對事實執著的另一個例子——有關桃花源的言說。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是描繪中國樂園的優秀作品。進入唐代後，首先是初唐王績對陶淵明非常推崇，寫有散文〈醉鄉記〉。王績創作了多篇模仿陶淵明的作品，例如前文提到仿〈五柳先生傳〉而作〈五斗先生傳〉，仿〈自祭文〉而作〈自作墓誌銘〉，〈醉鄉記〉無疑是對〈桃花源記〉的模擬。

直接以桃花源為主題的詩有王維〈桃源行〉。王維將桃花源描繪為仙界，但並不探討其真實性。<sup>33</sup>唐代的桃花源詩大致將其視為仙境，但既不說是虛構，也不說是真實存在。換句話說，真實存在與否並不是一個問題。唯一的例外是韓愈，他的〈桃源圖〉一開始就從桃花源是否真實存在的問題談起：「神仙有無何眇茫，桃源之說誠荒唐。」<sup>34</sup>——神仙是否存在尚且渺茫不明，桃花源的說法也同樣荒唐無稽。韓愈將是否真實存在作為問題，宋代的思考似乎從他這裡已經開始。同時代劉禹錫所作的〈桃源行〉雖然忠實地遵循陶淵明〈桃花源記〉的敘述，可是進入桃花源之後的部分就離開了原作設定，將之當作仙界來描寫。眾所周知，陶淵明的〈桃花源記〉設

<sup>31</sup> 明·胡應麟著：《詩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外編卷4，頁195。

<sup>32</sup> 清·袁枚著，顧學頡校點：《隨園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卷8，頁249。

<sup>33</sup> 唐·王維著，清·趙殿成箋注：《王右丞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卷6，頁98-99。

<sup>34</sup> 唐·韓愈著，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卷8，頁911。

定的是避秦而來的人們的後代繼續住在那裡，劉禹錫寫的卻是仙人居住。<sup>35</sup>總的來說，除了韓愈之外，唐代一般將桃花源視為仙界，並認為那裡的居民是仙人，然而對於仙人或神仙是否真實存在則不作追問。這可以說是唐代對桃花源普遍的理解方式。

但是，進入宋代，對桃花源的接受大為轉變。蘇軾〈和陶桃花源〉詩的「引」中寫道：

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殺鷄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見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鹽醢，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益衰。桃源蓋此比也歟。……嘗意天壤間，若此者甚眾，不獨桃源。<sup>36</sup>

蘇軾舉出實際存在的長壽村之類的聚落，強調像桃花源那樣的村莊在任何地方都有。他甚至提出水質良好、鹽分攝取量少等科學依據，從中可見宋人的理性思維方式。相較於唐人的仙界說，這完全是逆轉的捕捉方式。

我們在前面看了夜半鐘聲、桃花源兩個例子，唐宋之間的差異竟如此之大。到了宋代，人們對事實性變得重視起來，恐怕在其他方面也有類似的傾向。雖然唐宋在許多方面具有連續性，但在認識事物的態度上卻是斷裂的。宋代是一個理性得到確認、重視的時代，可以說已經朝著近代邁出了一大步。例如在經學領域，也能看到從以往訓詁學那種集團式繼承的方式，轉變為基於個人自身理解、解釋的態度。這種趨勢正好與詩學領域對事實性的重視相連動。

唐宋雖然常被一概而論，但本質上其實亦存在著巨大的差異與斷裂。我們可以認為，宋代開啟了嶄新的時代與文學風貌。

<sup>35</sup> 唐·劉禹錫著，瞿蛻園箋證：《劉禹錫集箋證》中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卷26，頁819。

<sup>36</sup> 宋·蘇軾著，張志烈、馬德富、周裕鍇主編：《蘇軾全集校注·詩集七》（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卷40，頁4750-4751。

## 徵引文獻

### 一、古籍文獻

- \*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 \* 梁·鍾嶸著，曹旭集注：《詩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唐·王維著，清·趙殿成箋注：《王右丞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 \*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唐·李賀著，清·王琦等評注：《三家評注李長吉歌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唐·孟郊著，郝世峰箋注：《孟郊詩集箋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唐·韋應物著，孫望編著：《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唐·劉禹錫著，瞿蛻園箋證：《劉禹錫集箋證》中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 \* 唐·韓愈著，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 \* 宋·胡子著，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 \* 宋·蔡正孫著，常振國、降雲點校：《詩林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 \* 宋·歐陽脩：《六一詩話》，收入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 \* 宋·蘇軾著，張志烈、馬德富、周裕鍇主編：《蘇軾全集校注·詩集七》，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
- \* 元·辛文房著，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明·胡應麟著：《詩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清·袁枚著，顧學頡校點：《隨園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

## 二、今人論著

\*〔日〕興膳宏：《新版 中国の文学理論》，大阪：清文堂，2008年。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ong*] Cai Zhen Sun, Chang Zhen Guo, Jiang Yun punctuated, *Shi Lin Guang Ji* [Broad Records of the Forest of Poem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2).
- [*Tang*] Du Fu, [*Qing*] Qiu Zhao Ao annotated, *Du Shi Xiang Zhu* [Detailed Commentary on Du Fu's Poem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9).
- [*Tang*] Han Yu, Qian Zhong Lian edited, *Han Chang Li Shi Xi Nian Ji Shi* [The Poetry of Han Yu Arranged Chronologically with Collected Annotations]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4).
- [*Song*] Hu Zi, Liao De Ming punctuated, *Tiao Xi Yu Yin Cong Hua* [The Collected Chats of the Fisherman Reclusive of Tiao Creek]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1).
- Kozen Hiroshi, *Shinpan Chugoku no Bungaku Riro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New Edition] (Osaka: Seibundo, 2008).
- [*Song*] Ou Yang Xiu, *Liu Yi Shi Hua* [Liuyi's Remarks on Poetry], [*Qing*] He Wen Huan edited, *Li Dai Shi Hua* [Remarks on Poetry Through the Ag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2).
- [*Song*] Su Shi, Zhang Zhi Lie, Ma De Fu, Zhou Yu Kai edited, *Su Shi Quan Ji Jiao Zhu* [The Collated and Annotated Complete Works of Su Shi] (Shijiazhuang: Hebe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0).
- [*Liang*] Xiao Tong edited, [*Tang*] Li Shan annotated, *Wen Xuan* [Wen Xuan: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6).
- [*Yuan*] Xin Wen Fang, Fu Xuan Cong edited, *Tang Cai Zi Zhuan Jiao Jian* [Collated Annotations on Biographies of Tang Talented]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9).
- [*Liang*] Zhong Rong, Cao Xu annotated, *Shi Pin Ji Zhu* [Grading the Poets with Collected Annotations]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1).